

[文章编号] 1002-5685(2007)06-0071-05

《汇报》的创办及其股份制尝试

□ 沈松华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杭州,310036)

[摘要] 本文考证认为,《汇报》创办过程中,容闳主要是名义发起人,而唐廷枢和叶廷眷最为关键。郑观应所撰的创办汇报章程是照搬了轮船招商局的局规章程,《汇报》创办人的买办特征使《汇报》成为中国近代第一家试验股份制的中文报刊。

[关键词] 《汇报》;创办;章程;股份制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1874年6月16日创刊的《汇报》是上海第一份国人自办报纸。但是有关《汇报》的研究,除新闻史籍如《中国新闻通史》外,专门的文章凤毛麟角。《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9期发表了孟鹏的文章《关于〈汇报〉的考证》,认为唐廷枢是《汇报》的真正发起人,郑观应是具体策划者,其观点其实脱胎于李吉奎《容闳与近代中国新闻事业》中的研究。笔者认为,《汇报》几个创办人所起的作用尚可商榷,同时,关于《汇报》,也还有更重要的价值——它是第一个试验股份制的中文报业。本文拟对《汇报》的创办作进一步考证,并讨论它的股份制方案的来源与意义。

关于《汇报》创办人的考证

据《中国报学史》等资料,《汇报》为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所发起,上海县知县叶廷眷“捐款首倡”,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实助成之”,以官民集资入股形式创立报社,拥有资金银1万两。入股人多为广东籍,广东人邝其照(容阶)主持报务。

容闳在《汇报》创办经营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很可推敲。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指出:“1872年,容闳以留美学生副监督的身份赴美,次年短期返国时筹办了这份报纸。旋又去美,未参与报务。”^[1]李吉奎考证认为:“1873年春,为着介绍中国方面购买武器事,容闳回国联系,其间,他还作为中国官方代表与秘鲁专使谈判出国华工问题。乘此机会,容闳在上海与香山同乡创办了《汇报》。”但他职有所专,不能亲自操持报务。又说:“9月1日(农历七月二十一日),容闳乃决定由葛理出名承项,易名《彙报》,聘管才叔为主笔。”^[2]二人的观点都认为容闳筹办了报纸但未亲自主持报务。笔者认为,即使在《汇报》筹办过程中,容闳的作用也并不重要。据容闳《我在美国和中国的生活》中的回忆及学者石霓的考证,1873年夏秋容闳因购买武器事回国,11月、12月在天津两次协助李鸿章参与秘鲁华工问题谈判。12月中下旬容闳离津返沪,随即应李鸿章调查秘鲁华工情况之命速赴美国,大概1874年初春到达美国。^[3]而《申报》说《汇报》创办之由是杨月楼诱拐案:“盖《汇

[收稿日期] 2007-04-20

[作者简介] 沈松华,男,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

报》之设,实基于以绅控扰一案而已。当时本馆指陈刑讯之惨,以故地方官挟怒而另设一报以谋抗我也。”^[4]此案发生在1873年十一月初三(12月22日),正是容闳到达上海没几天。《申报》1874年3月12日载文说:“现闻粤人拟在上海另开新闻馆一所,首先提倡者,上海令叶邑侯也;提议开馆者,唐君景星诸人也;倡立馆规者,容君纯甫也;主笔诸君,皆延请粤中名宿也。馆则设立于招商局侧,并闻另延西人代为出名。”显然,《汇报》从倡议筹办到创刊持续了半年左右。这里的关键是容闳离沪赴美的时间,容闳如果真的是接李鸿章之命后马上动身,^[5]那么《汇报》之事必然是他在上海逗留处理幼童留学事宜时,恰逢杨月楼案之起,参与香山同乡办报之议,有所策划协助,然而没过几天就匆匆离去,并不可能主持筹办。葛理出名承项更不可能是容闳决定的,因为他早已赶赴秘鲁调查华工问题。^[6]由是观之,历来以容闳作为《汇报》发起人,这种身份主要是名义上的。

对于《汇报》的另一位关键人物唐廷枢参与创办《汇报》之因,李吉奎说:“1873年年中,唐廷枢脱离怡和洋行,改任轮船招商局总办。唐氏在掌握这个重要企业之后,也希望有一个报纸表达自己的思想、主张,以扩大自己和企业的影响;他想到了容闳。”^[7]孟鹏进一步下结论说:“此即为《汇报》之发轫。”^[8]唐廷枢在《汇报》创办过程中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不假,但把《汇报》的“发轫”归结于唐有意办报以表达自身主张和扩大企业影响,过于武断。事实上,作为“曾经受过彻底的英华教育”^[9]的得风气之先的人物,唐廷枢对文化和公益事业多有热心,1874年在协助创办《汇报》之前,还与英国领事麦华陀等人一起创办格致书院,成为首创董事之一,“俾华人得以博览翻译西书西报,议论新事也”;又积极赞助傅兰雅的英华书馆。^[10]报纸反映、宣传大股东的主张,这是必然的。从《汇报》的内容倾向看,它反映的是以该报创办者群体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洋务派的共同主张。

作为“捐款首倡”者的叶廷眷,以军功起家,1864年主持上海会捕局,1867年任上海县令,旋调南汇知县,1873年又知上海县,颇有政绩。据光绪《南汇县志》与《上海县志续志》记载,叶在任期间,多次输资以解民困,对外国侵略者的罪恶行径,亦能予以抵制,维护民族权益。^[11]根据《申报》记载,《汇报》之创办缘起于杨月楼案,“地方官挟怒而另设一报以谋抗我也”。虽然《汇报》创办的宗旨不在于此,但杨案是第一推动力,从这个角度说,叶廷眷才是真正的发起人。因为这个官方背景,《汇报》股东中有很多上海地方官员。1875年5月《彙报》停办,“清理帐目,加入新股”,于1875年7月16日改名《益报》出版。而叶廷眷离任时间正好在1875年5月(光绪元年四月),《彙报》应该是由他的离任而停刊的。主持报务的邝其照也离开了报馆,9月带领第四批留学儿童赴美。由于《汇报》核心人物的离去更换,重开的《益报》锋芒全无。

因此,从已知事实来看,唐廷枢、叶廷眷、容闳、郑观应等人共同发起创办了《汇报》,其中唐廷枢与叶廷眷最为关键,容闳并未承担主要角色。郑观应的作用,下文将会涉及。

《汇报》章程的股份制实践

创办《汇报》的章程是由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和实业家郑观应撰写的。学者们多因为郑的这份《创办汇报章程并序》^[12]而认为报纸的具体规划由他完成。与在这之前创办的独资报业和《申报》、《循环日报》等依托协议的合伙制报业不同的是,《汇报》的这份章程,提出了中文报业第一个股份制试验方案。

章程规定报馆的股本总额为一万两,分一千股。如果了解一下近代报业的基本情况就知道,一万两的股本在报业是不小的投资,比如《申报》,开办资本只有1600两。而1000股的股数大大增加了股权分散的可能性,每股10两,使《汇报》的股票能够面向社会中下层人士。章程对股票作出了详细规定,包括股票

面值、分派方式、出让、挂失、更换名号等。利润的分配有三种方式:官利、溢利与花红,并规定了分派时间。条文中还规定了报馆的内部治理结构与管理制。报馆实行委托代理制,由总理负责日常事务。在董事的产生办法上只提到了“公举”,没有实行轮船招商局的规定达到若干股作为董事的做法,不过在实践中,必然是大股东如唐、叶、郑等人充任董事。章程规定了股东大会事项,包括召开时间、花红分派审议、考核更换总理、选举董事等。当然,在近代公司普遍忽视股东大会的环境下,汇报局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除了整顿改办等特殊情况下是否召开过股东大会,不容乐观。该章程还规定了经理的职责和局员制度;在财务管理方面,包括银钱存息、经费开支、帐目核算与审查等,实行了财务公开制度。从很多方面看,汇报局已初具准公司的模样。

那么,《汇报》为什么会采取股份制方案呢?

19世纪中叶五口通商后,外国企业纷纷进入中国,许多洋行采取了股份公司制度,使这一企业制度逐渐被国人所关注。我国第一个尝试股份制的企业是1872年成立的轮船招商局。首任总办朱其昂招股不力,企业亏损,1873年轮船招商局试行商办,唐廷枢、徐润等著名买办入主招商局,重新制定招股章程与规章制度,使招商局走上了发展之路,也带来了国内股份制企业的兴起。

《汇报》之所以会成为中国第一个实验股份制的报业,正是借了轮船招商局的东风。我们把《汇报》章程与唐廷枢、徐润入主招商局后重新制订的局规14条、章程8条^[13]一对照,就可以发现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汇报》章程其实是拷贝了轮船招商局的方案。除了少数内容要结合报馆特殊情况(第4、6、7、13条)外,其他条文完全是从轮船招商局的局规章程中照搬或稍加修改挪用过来的。唐徐等拟定的局规章程为后继的许多近代企业所仿效,显然《汇报》是第一个仿效者。另外,《申报》又有“倡立馆规者,容君纯甫也”的说法。

由此来看,尽管郑观应是章程的撰写者,但其主要内容是唐廷枢等人的功劳,报纸的规划只能说是合力的结果。

《汇报》创办者们的这种挪用看似简单,却创新了我国报业的制度模式。与中国大地上后继产生的无数由文人发起把持的报纸不同的是,它的几位创办者都是近代著名的买办、实业家,了解新式企业的组织与管理,是中国最早的几个积极提倡并实践近代股份制企业制度的先行者。容闳于1867年向江苏巡抚丁日昌提出了“联设新轮船公司章程”,建议“组织一合资汽船公司”,这是迄今见到的中国最早效仿西方近代股份有限公司的文件。他留学美国,后又常年驻美,对西方报业公司必然很熟悉。唐廷枢主持英国怡和洋行十年之久,并在多家外国企业中附股。1873年担任轮船招商局总办,在他的主持下,招商局开始赢利。郑观应当时正担任太古洋行买办,他是招商局的股东,后来又曾入主招商局。1879年他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成为当时股份制企业制度最完备的企业。叶廷眷虽然主要是官场人物,但也精通实业,熟悉洋务,曾在朱其昂死后受李鸿章之命整顿招商局。而主持馆政的邝其照也是中国最早浸润西风美雨者之一,其青少年时代就是在美国度过的。正是由于这些人的特殊身份,他们在创办《汇报》时,自然而然地将组织管理企业的那一套挪用到了报纸上,制订了股份公司制的报馆制度。

所以,要讨论《汇报》股份制的得失,其实就是讨论轮船招商局方案的得失。这方面的文章很多,不拟赘述。需要指出的几点是:

首先,从某种角度说,《汇报》与轮船招商局不具有可比性。轮船招商局是洋务派兴办的第一家民用企业,其规模大,融资巨,社会影响广泛。以轮船招商局为代表的官督商办的股份制企业的设立当时采取的是特许制度,必须经地方衙门报朝廷批准。这也是前准则时期兴起的公司的特征。而报纸规模小,招股集资影响面也小。作为非官督商办的民营企

业,尽管它采取了类似公司制的招股方式和企业制度,但不可能得到特许,也就不能视为公司。《汇报》股票的市场流通情况不明,但从当时情况看,其股票在市场流通的可能性不大。

其次,近代企业股份制刚刚起步的稚嫩与不规范是导致《汇报》挫折的重要原因。比如,由于报纸的宣传报道遭到官方的非议,不少股东要求退股,《汇报》只出了两个半月便宣布改组。这种退股行为违反了公司生命永续原则,在规范的股份制中是不允许的。但中国的公司律要到1904年才颁布,在前准则时代的股份制还有浓厚的传统合伙制的痕迹。轮船招商局、机器织布局都发生过退股的事情。比如唐廷枢、徐润离开轮船招商局时,许多通过他们的联系而获得的买办资本次第以提款、下股等形式退出招商局。^[14]从另一层面说,在股东大会形同虚设、股东权益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股本的退出权也是股东表达意见的一种有效方式。^[15]

第三,《汇报》的信用基础主要是人合而非资合。它的股东是在沪粤人和上海县官吏,集股依赖于董事们的私人网络,缺乏广泛性。从创办动机来看,资本的人合性恐怕也是创办者的意愿,这使它更像一个合伙制的企业。但这也是早期股份制企业的共同局限。事实上,在传统根深蒂固的地域、家族观念影响下,直到20世纪,很多公司招股仍然依靠的是地脉人缘。

第四,《汇报》虽然也有官股,但其性质是民办的,并不存在轮船招商局等近代企业具有的“官督商办之局、权操在上”“官总其大纲”这一问题。然而在近代,报纸的属性更多的是政治的、社会的,人们重视的是其传播信息、开通民智的功能,而忽略其企业性质、经济属性。报纸的特殊性和时代环境决定了《汇报》在外部要受到官方的更多钳制,使它不断整顿、更名,仅一年多就彻底停刊了。

《汇报》作为中文报业的第一次股份制实践,自有其历史意义。但无论从报业自身还是

国内环境看,它都是一个早产儿,一颗流星。清末民初后继的国人办报往往只是把股份制作为集资手段,其内部治理结构甚至不及《汇报》。早期的中文报业公司是在外国人手中成长起来的,其代表是《申报》和《新闻报》。而公司制在中国报业真正推广,则要到20世纪30年代。关于这个话题,拟另文讨论。

注释:

- [1] 方汉奇《中国新闻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86页。
- [2] 李吉奎《容闳与近代中国新闻事业》,见吴文莱编:《容闳与中国近代化》,珠海出版社,1999年,第394、400页。
- [3] 容闳《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石竟译注,百家出版社,2003年,第202-214页。
- [4] 《申报》1874年11月21日,转引自李吉奎《容闳与近代中国新闻事业》,第395页。
- [5] 李鸿章于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1874年1月7日)在致总署的信中说:“容丞十月杪(是1873年12月中下旬)回沪,接陈主事求助之信当即速回。”十月二十一日(1873年12月10日)的信中说:“……容闳本系送地来京,现今搭船由沪赴美……”可见容闳不可能在上海停留多久。转引自容闳《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第205、209页。
- [6] 容闳启程赴秘鲁正在1874年农历七月。见容闳《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第210-211页。
- [7] 李吉奎《容闳与近代中国新闻事业》,第395页。
- [8] 孟鹏《关于〈汇报〉的考证》,《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9期,第76页。
- [9][10] 汪敬虞《唐廷枢研究》附录《唐廷枢年谱》,第157、180-181页。
- [11] 参见珠海信息网历史人物栏目。
- [12]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173-1177页。
- [13] 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册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44-848页。
- [14] 《交通史航政篇》第1册第153页,转引自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65页。
- [15] 参见杨在军《晚清公司与公司治理》,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18-119页。

The Establishment of Hui Bao and Its Attempt at Shareholding System

SHEN Songhua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36)

Abstract: The paper finds that Rong Hong was the initiator in name and the key persons were Tang Tingshu and Ye Tingjuan in the establishing process of Hui Bao. The comprador feature of the initiator made Hui Bao become the first Chinese newspaper under the experimental shareholding system.

Key Words: Hui Bao, Establishment, Regulation, Shareholding System

[责任编辑: 刘小燕]

(上接第56页)

和谐,实质上就是一种人人感到自由、实际自由的状态和关系。^[4]

注释:

- [1] 参阅[美]欧文·M. 费斯《言论自由的反讽》(导论),刘擎、殷莹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4页。费斯先生在美国语境下说:“如果国家之外的权力正压制着言论,那么国家可能必须采取行动,来增强公共辩论的活力。国家可能必须给那些公共广场中声音弱小的人配置公共资源——分发扩音器——使他们的声音能被听见。国家甚至不得不压制一些人的声音,为了能听到另一些人的声音。有时这就是别无选择的方式。”我这里只是把费斯先生的论述作为方法论来应用。至于他在美国语境下阐述的观点是否适用当下的中国语境,我赞同贺卫方教授的看法,他说,“简单地将费斯教授

的结论用于中国可能会出现某种类似‘直把杭州作汴州’的时空错位”。参阅贺卫方为本书写的《中译本序》。

- [2] 转引自王文章、侯祥祥总主编《中国学者心中的科学·人文》(人文卷),云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3页。
- [3] 参见周辅成主编《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集》,商务印书馆,1966年,第19页。
- [4] 有学者指出,物质文明的富裕、制度文明的民主、精神文化的文明,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追求的终极价值目标。还有学者认为,富裕、和谐、自由是社会终极价值目标。这些论述是富有启发性的,对我们进一步思考中国传播环境下的媒介民主、和谐、自由等问题都有一定的启发性。参见肖群忠《伦理与传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9~161页。

On Journalism Spirit

YANG Baojun

(School of Journalism,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The paper makes an analysis on the journalism spirit which represents the spirit of public and democracy. It thinks that the journalism spirit aims to serve the public and stick up for the public interests.

Key Words: Journalism, Truth, Justice, harmony

[责任编辑: 刘小燕]